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4

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

王蕾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从早年知识启蒙和世界观型塑的时期,到长沙求学思想转变和各种主义选择的时期,最后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实践积累的时期,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反思的自发性,发展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具体展开,最终理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和逻辑。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以及具体文化建设的展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26-09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和宝贵经验,作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党的百年奋斗史基础上的坚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寻来马克思主义这剂良方以救治危急的中国的现实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初步蕴含了思想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思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显得极其重要和必要。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基因是其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在大众意识之中,这样一种先在的理论框架类似于‘认知图式’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②。毛泽东在生命成长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曾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这是他能够形成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累积,是其形成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理论关键和实践保障。因此,理清毛泽东个体成长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而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认知学习和批判继承的过程作一历史的考察,对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从自发到自觉: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演进理路

毛泽东成长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收稿日期:2022-05-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KS002)

作者简介:王蕾(1995—),女,江苏淮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尚庆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的复杂场域,其青年时期思想环境的特点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相互冲突与融合,这既使得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能够广泛接触并吸收全部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使得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结构处于一定的混沌状态,从而加深了其抉择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困难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毛泽东直面中国现实的文化基因,构成毛泽东思想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形成史就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知识启蒙与世界观塑造期形成自发性

青年毛泽东的知识启蒙,既来自于私塾教育中的儒家正统思想,也来自所处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六年“孔夫子”的蒙学生涯,传统的乡村私塾系统教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学习《三字经》等启蒙知识后,进一步获得四书五经等科举知识。但是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一样“背得但是不懂得”。此外毛泽东也通过阅读其他书目获得更加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例如关于中国历史典籍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史记》等,他更喜欢阅读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说,例如《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就后者而言,又分民间文化传统中的“小传统”和“大传统”。比如以父亲毛顺生为主宰的家庭文化的“小传统”,毛泽东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村家庭,严父慈母,父亲对外是精明会打算的富农形象,在其思想水平上读书就是为了发家、记账,所以在毛泽东受教育一事上不理解也不支持,对内是压迫的大家长形象,不听意见独断专制,“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们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①,而母亲则是温和善良并信仰佛教的形象,常常救济他人,二者都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国外毛泽东学者特里尔在分析毛泽东的家庭关系时,形象地将毛泽东的家庭关系比作是一场造反斗争的两国,将其父亲的压迫与中国社会僵硬的等级制度的压迫相联系,认为这也导致了毛泽东骨子里对封建压迫制度和思想的反抗态度并

最终成为一个“造反者”。而“大传统”就主要指湖南所特有的地域性文化传统,比如湖南文人一以贯之的理学传统,提倡经世致用,而这主要是在长沙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习得,也包括湖南农民具有的反抗性和温和性的矛盾特质,这些成为毛泽东对农民意识的最初萌芽。

对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青年毛泽东而言,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其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传统文化的知识也构成他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在最初对传统文化的“被灌输”接触中,毛泽东始终对传统文化呈现一种拒斥的态度,这种对传统文化既学习又反抗的双重性构成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自发性认知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自发性认知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思的自发性,也就是说他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接受的态度,而是反思的态度即怀疑的态度,这一点在当时极其可贵。因为彼时毛泽东身处的环境使得传统文化成为其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在未有科学的分析工具介入的前提下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只能是一种反思性认知,同样的,这也使得这种认知必然是一种自发性认知,即不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的内在规律及其本质,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在状态,因此称之为反思的自发性认知。

(二) 思想转变与主义选择期发展自发性

毛泽东最初确立自己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不是传统儒家思想,就是由他自发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性导致的。这种自发形成的反思性,使得青年毛泽东对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知其不足却抱有期望,相信维新主义改良派的主张,希望自上而下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而不改变中国的本即三纲五常的思想,因此根本上还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随后接触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很快转变思想,支持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并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建议新政府的构成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而梁启超为外交部部长,这种政治设想也折射出毛泽东在此时各种主义选择中思想的混乱状态。但是不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在面对各种流派和思潮的西方文明冲击下,毛泽东始终保持对传统文化的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冷静思考。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化深入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加深了对传统文化整体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不同于知识启蒙时期的灌输式学习,长沙求学时期毛泽东既通过自主性学习和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内容有了整体性把握,又通过学校优秀老师的带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在对西方思想的学习和扬弃中,毛泽东反而更加坚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的新的理解范式的拓展。因此,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自发形成的反思性,逐渐发展为冷静思考的态度,即坚持中国实际,融汇中西。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形成对传统文化冷静思考的自发认知,既来自于湖南重实学的湘学传统的影响,也来自近代中国思想家融汇中西的理论作用。湖南固有的理学传统历史悠久,一以贯之。自王夫之创立船山学派,提出“天理即在人欲”的主张,一反朱熹理学,而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崇实重行的学术风格;近代以来,曾国藩继承湘学传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政治上持有强烈的保家卫国之志,投笔从戎;戊戌时期,谭嗣同更是将船山之志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之源,积极投身政治,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主要代表;辛亥革命时期,更有黄兴这一革命领军人物,重视实际分析战争的开展和形势。毛泽东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实际,强调“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①,从当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境遇出发,从自身对世界认知的现实需要出发,认识到了了解中国是改造中国的首要 and 基础,是学习西方和与西方做比较的前提。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睁眼看世界始,学习西方并尝试了多种融汇中西的努力,如从器物、制度、思想等多方面入手。毛泽东一度十分崇拜的康有为就是融合中西的重要代表,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是在未改变现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融合中西特长的变法改革。毛泽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效融合的思想的形成还离不开老师杨昌济的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

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②,因此毛泽东主张一种中西比较的视野,甚至秉持在“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③的追求下实现中西融汇。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种冷静思考的基本态度,虽然是对前一阶段即知识启蒙时期的反思性态度的发展,但还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自发性认识阶段,而未转变为一种自觉性认知阶段。此时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仍然处于一种直观的、非理性的认知构架,因而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自觉认知,未能达到对传统文化整体内涵的把握。具体而言,其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反思的态度发展为冷静思考的态度,体现了对传统文化认知水平的一大进步。一方面,不同于知识启蒙时期狭隘知识的获得,在长沙求学期间,不论是毛泽东的自主性学习还是学校老师的教导,均使得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更加全面的认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新的认识工具即西方文化的充实使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就像毛泽东所言有了比较的视野,以另一种视角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其二,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只是一种冷静思考的自发性认知,根本上而言是因为主观上未能确定明确的科学认知工具,也就必然未能达到认识上的自觉状态。虽然毛泽东引入了西方式的认知框架,持有一种中西对比的方法论,但是由于其比较的西方视角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混乱状态,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仍陷入无秩序的自发状态。因此,称之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认知。

(三) 信仰确立与实践累积期转变自觉性

不论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发性认知的初步形成还是后续发展,都没有突破单一的思想领域,仍然是基于思想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性认知,因而未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本质,从而也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的自觉认知。而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第二性本质,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运用辩证方法分析和批判传统文化,并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改造后的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的形成,最初诞生于毛泽东的思想之中。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既有其作为个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更是中国具体实践的现实经验的作用。就主观认识能力而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前提就在于他早年对传统文化形成的自发性认知。也就是说,不同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持有彻底否定、严厉批判的认知模式,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冷静思考的基本态度。因而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使得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迅速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即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本质,它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体制基础上的观念上层建筑,达到了认识主体主观认识能力的根本跃升。而就具体的现实革命实践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等现实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然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得以彰显。1935年“华北事变”后,知识分子兴起“新启蒙运动”反思五四以来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简单的否定。毛泽东正是在反思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论自觉,这也意味着此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对其内在本质的真正把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一方面毛泽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②,这样才能主观上确立唯物史观的科学认知工具。另一方面毛泽东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这一时期强调的是传统文化作为具体实际的思想文化层面被纳入结合的体系。而这种自觉的科学认知,具体表现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始终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和不足之处,对我国的历史遗产即传统文化从来不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始终看到其两面性,相反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掀起的反传统思潮表明他们只是看到新旧文化的对立,“他们只看到新旧的对立,没有认识到新文化是从旧文化中发展来的,旧文化中仍有可为新文化所吸收继承的精华”^③,毛泽东对此,认为其是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正确的态度应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方法来认识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而这种具体的历史的方法总体上表现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④。因此,称之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认知。

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③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界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具有永恒的真理力量。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正是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因此,毛泽东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智慧,但是毛泽东个人在其中仍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就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的形成史而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而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之所以从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一) 世界观层面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奥秘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次将意识的本质归于对物质活动的能动反映,指出是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作为依赖于社会存在的存在,随着其变化与发展而变化与发展,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社会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出发,论述了生产力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社会两种流行的意识形态,一者是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它们要么只是从观念出发解释物质生活,要么是只能从直观的方面理解客观事物,都不能达到现实个人及其社会活动基础上的对事物真正本质的认识。二者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赫斯等人,用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爱和抽象的人性去调和现实的阶级矛盾,只能是囿于观念自身的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起初是在否定、批判的意义上而言的,指称脱离现实的虚假的观念体系,从而通过对这种虚假的观念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形成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科学认

知,在《形态》中初步表述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对此更加完整的论述见于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学习和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体制的产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④。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与旧文化存在着质性差别,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认识传统文化,首先要认识到这种经济基础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其次才是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改造,只能是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最后这种改造还必须适应于或者服务于新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既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必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毛泽东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敏锐察觉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例如在军队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中警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抬头,古田会议中他就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思想来源和对应举措,其中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就根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对此毛泽东提出纠正的方法:“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清理、替代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二) 认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规律和方法以及认识真理性的学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根本基石即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变革,是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彻底决裂,这就包含了全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旧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忽视人的能动性,将物质世界理解为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唯心主义虽然发挥了人的能动性,却只是头脑中的观念的自我演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从实践出发,在人的物质性活动的基础上既坚持了唯物反映论,又坚持了能动反映论,从而真正理解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理解了认识的辩证性质,从而将认识看成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指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学说”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其做了明确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脉相承,体现了认识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比如有的学者同样认为“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包含着认识的客观实证性和实践的价值主体性”^③。而“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又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和深化,从最初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治学态度,到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哲学视角,再到清末顾炎武等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风,发展到近代即是湖湘文化传统中的重实学思潮。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中要始终坚持能动的认识论,在革命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及传统文化的认知,在对马克思主义及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入中指导革命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才能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

(三) 方法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包含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而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本中体现了其辩证法的运用,强调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具有的革命性质,“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以及“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

毛泽东阐释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首先,矛盾即对立统一,就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我们认识和分析任一客观事物,就是认识和分析其内部矛盾。因此,对传统文化,要认识到其内部矛盾的双方分为“精华”与“糟粕”,注重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其包含的“精华”与“糟粕”,从而达到全面而非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③薛光远:《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四重维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面的科学认知。其次,矛盾是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暂时性、革命性去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前述对传统文化的分析也只是暂时性的,是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程度,例如对孔子的认识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是有所不同。最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现实的矛盾各不相同,因而体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区别。既要重视普遍性规律,更要重视特殊性规律,尤其是特殊性规律,它是具体实践的唯一法门,认识和解决矛盾,必然是认识和解决不同“个性”的矛盾具有的特殊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基础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与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即按照“本本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和规律,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结论。

三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现实启示与当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而追根溯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 and 实践探索早已有之,作为党的创始人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形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思想以其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而这独创性既来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经验,也来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和实践探索。因此,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内容,就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继承和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坚持文化建设实践的认真践行。

其一,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科学视角,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区别与联系,从而在整体中认识部分,真正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这一认知理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接续发展。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文化革命”的线索下、在“破”与“立”的历史语境下,毛泽东反对“全盘西化”的形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即古代文化一分为二,即“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主张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立场,始终坚持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就要求坚持全面整体的科学态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思想糟粕,既包括与封建制度休戚相关的压迫思想,也包括阐释人性恶的错误思想和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合的落后思想,均是必须批判并抛弃的部分。另一方面是思想精华,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根基,是值得继承和发展的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①,而这些精华既有历史性的内容也有永恒性的部分,都需要历史性地辩证地对待和认识。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再是横向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积极因素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而是纵横交错的视野中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灵魂构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不可或缺的根基。因此,新时期更加重视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工作,是对传统文化认知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其二,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刻理解,因此,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科学内涵和深刻意蕴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革命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战争年代就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这表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阐释。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本本或是词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展开斗争,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出发反对后者从苏联的洋教条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在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基础上,批判党内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在此基础上,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提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反对四版说,即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模板,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其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内生于传统文化之中中华儿女从古至今创造的思想精华和精神财富,其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必须注重继承和发展。20世纪初,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交融中黯然失色,在处处重视洋先生、流行“出洋迷”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就能够沉下心来,暂时留在国内研究,并理性认识到东方文明作为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的存在,自身具有的丰厚资源值得深入研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更是汲取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精华,运用到具体战役中并取得了多次胜利,例如,在历次“反围剿”中运用“诱敌深入”这一策略克敌制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创造性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

创工作。“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其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并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和论断,在其治国理政体系中系统论述文化工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④。通过考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过程,更是论证了这一点。首先,文化建设工作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不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哪个时期,党始终坚持伟大旗帜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一向注重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是毛泽东却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不是坚持所谓的本本或者公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步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是有了新的历史特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要求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价值底色和实践指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旗帜,又要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注重新时期新变局的创新动力。其次,文化建设工程中要处理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三种文化内在构成中国文化完整脉络,也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文化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底,在此基础上党发展创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一切文化的科学认知,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既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精神价值,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页。

又反对对其进行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对革命文化既强调其对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又指出群众主体对革命文化创造的重要性,基于此,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工作,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化,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光荣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民智慧发扬光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起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脉相承的文化建设有机整体,而这三者共同为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最后,文化建设中文化创造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激发文化创造力就

是要激发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具体而言,要明确文化创造的主体、对象和内容三方面都要坚持人民导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创造的主体也必然是人民群众,文化服务的对象也必然是人民群众,文化植根的土壤也是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在文化领域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毛泽东推行扫盲活动并鼓励人民群众增强文化水平、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主张艺术来源于生活。新时期治国理政思想中也强调中国文化事业要依靠人民力量,文化创造为谁是中国建设的根本问题,强调人民是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①。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Mao Zedong's Scientific Cogniz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ANG L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20023,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scientific cognizance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al has gone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spontaneousness to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early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hape of the world views, to the period of thought transformation and various doctrine choices about study in Changsha, and finally the period of establishing communist beliefs and practicing accumulation, his cognizance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develops the spontaneity from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calm thinking, and finally the consciousness of "taking its essence and removing its dro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ased o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survey of his scientific cognizance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al,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si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used, and the world outlook,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dimension are carried out. Clarifying the history and the logic about Mao Zedong's scientific cogniz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inal purpose. It is of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scientific cognizance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concret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24页。